

黄显华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道与路

靳玉乐,于泽元

(西南大学 教育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黄显华教授是两岸三地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元老,他满怀激情投入教育,在做中小学教师期间即开始反思与实践。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20年间一直醉心于课程与教学研究,在其中体悟到“爱”、“知”、“思”、“进”之道,走出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拓荒之路、方法之路,并在“道”与“路”之间寻求不断的融合。

关键词:黄显华;课程;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144-08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

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

——余秋雨:《霜冷长河》

上面诗一般的两段文字,是黄显华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引用的。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30多年来的教育实践和研究生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段文字,正表征了这位两岸三地课程研究的元老对学术生涯的诗意情怀,体现了他对课程与教学中“道”的追求和“路”的创造。在他即将荣休之际,让我们走进这位学界元勋的学术世界,品味他的“道”与“路”,并从中咀嚼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感觉。

一、实践与学术生涯的轨迹

对于黄显华教授所引用的两段文字,我们似乎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隐喻,喻示着一个人的知识、见解和行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个人生命史使然,需要深入的个人叙事,才能够将其中的真实秘密深刻地挖掘出来^[1]。因此,在理解黄显华教授的学术研究的“道”与“路”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对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还是再次做了访谈,并且收集

了不少他讲述自己人生历程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显华教授教育实践与学术生涯的轨迹。

(一)早期的教育实践

1966年,黄显华教授进入和他一生有着深刻缘分的香港中文大学,和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一样,他选择的是化学。然而,有两本书深深地震撼了他,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乡土建设》。通过这两本书,他才发现在学问方面,还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于是转到社会学系,开始了社会科学的探求。也许是社会学给了他很大激情,他在中大期间,不仅成为崇基学生会的干事、新亚社会服务团骨干,而且是一个有些激进的社会运动者,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了不少针对港英政府的抗议活动,还会唱不少爱国歌曲,也和中大一些教师和学生一起办理了一所义务中学,帮助失学的人继续学习。不过,他在毕业的时候,却成为了一名教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黄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我父亲是当教师的,他对我多少有点潜移默化影响。大学四年级时在圣基道儿童院中的基石小学替学生补习,觉得很有意思,毕业后便顺理成章在基石小学工作。”^[2]

他前后在三所小学工作了3年,一个新成立的学校,也就是金禧中学吸引了他。这是一个基督教修女办的学校,不用说最初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让他感到欣喜。就是在金禧中学里,黄教授开始了自己教育实践的探索。最令他得意的,就是不用教科书

* 收稿日期:2008-05-19

作者简介:靳玉乐(1966-),男,河南邓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课程与教学论。

了。那个时候他教的是经济与公共事务,他觉得教材编写得一点也不好,所以就自己决定教学的内容,不用教科书。那个时候,香港教育署有督学,会时不时来学校检查教师是否用了教科书,每个学期改了多少作业,这样做还是有些冒险。幸好,在金禧中学6年时间内,督学一直没有查到这里。然后由于种种原因,5年后金禧中学被政府封校,他随着学生来到了新办的五育中学。

在五育中学,他对教学改革的热情依旧没有消减。那个时候他教的数学,他找到校长,让校长同意他不用批改学生的作业,因为在他看来,花费大量时间批改学生作业是一个投入多而效益低的活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并没有真正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只有投入了,学生才会有真正的快速的进步。校长比较开明,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就把40个学生分成了10个小组,首先每个小组在一起做作业,做完之后,在黑板上出10道题,在每个小组抽出一个人来到黑板上把题目做出来。然后,再让其他组的成员来改,并说明对在什么地方或错在什么地方。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真正投入到自己的学习活动中了,而且也防止了彼此之间的抄袭,做题的原理也更加明晰了。经过这样的改革,不仅教师从繁重的作业批改中解放了出来,学生也学得轻松、愉快,学习成绩在学校也是遥遥领先的。

在中小学教学期间,黄教授自己说那个时候并没有读多少有关教育的书,但是在大学时候有两个教育家的著作一直在影响着他,一个就是陶行知,从陶行知那里他感受到了对教育的热忱,认识到学生要做到知行合一才是真的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巴西的保罗·傅雷叶(Paul Freire),从这位穷人的教育家那里,他学会了深入的反思,而且这种精神一直深入他的骨髓,让他在教学中一直保持清醒,并不断进行改革。

(二)走向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生涯

尽管如此,在五育中学6年之后,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黄教授还是觉得自己在教育上遇到了很多困惑,该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会了。于是1984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的导师泰勒夫人给他以极大的影响,泰勒的人文主义精神也给他很大的鼓舞。一向刻苦学习的精神使他在第三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一个问题摆在了这个已经迁移到美国的家庭面前:留在美国还是

回到香港?黄教授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独断,而是全家投票决定是否留在美国。结果,举手同意留在美国的是年方9岁的儿子,他觉得美国的学校要比香港的学校自由一些。这个结果虽然让他震撼,反而坚定了他回香港的决心:香港的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更需要自己去耕耘,更有发展的天地!

1987年,他到香港大学任教,1988年,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了长达20年的工作历程,而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贡献,也在这20年间一一成型。在这20年的历程当中,他总结出了自己实践和思考的六大方向:

1. 课程理论;
2. 教育文献的整理和传播;
3. 普及教育与课程;
4. 语文课程与教学;
5. 教育心理学与课程发展的关系;
6. 伙伴关系下的学校更新。

在课程理论方面,和李子建教授合作的《课程理论:范式、取向和设计》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这本书以休伯特(W. H. Schubert)所提出的三种课程范式^[3]为线索,对西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课程理论与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仅是课程研究方面非常宝贵的中文文献,而且在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界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其余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与霍秉坤教授合著并于200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再版的《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与霍秉坤合著的《课程范式:意涵、应用和争议》,与朱嘉颖合著的《课程领导与校本课程发展》以及与孔繁盛教授合著的《课程发展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伙伴协作》等。这些课程理论涉及了基础理论、教科书设计、课程决策、课程领导和教师专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教育文献的整理与传播也是黄教授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和自己的同事一起,于90年代初期即着手对香港的教育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出版了一个重要的集子,就是《香港教育研究分类目录(1946—1982)》。虽然在这段时间内,香港的教育研究并不繁荣,但是把这些文献一一整理出来,并进行有意义的分析并不容易。另外一项是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建立Chinese Eric(中文教育资源信息中心),也就是要建立华人社会教育研究的免费的电子数据库。可惜,这个项目由于资源不足只做了两

年便停止了。

黄教授回到香港之后,就开始了对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休伯特所提出的一个观点:“课程这个课题是由强迫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厘清普及义务教育和筛选教育这两个制度下课程设计的性质是课程论研究非常重要的课题。”^[4]在最初的时候,他对普及教育的关注是通过一些主编的著作来实现的,1993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教育系列丛书,分别是《香港教育:迈向2000年》(与戴希立合编)、《中学教育:课程发展》和《小学教育:课程发展》。这些著作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普及教育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普及义务教育的课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汇聚了各方面的意见。因此,1996年在教育委员会委托中大教育学院展开强迫义务教育课程研究的时候,仅仅半年时间,黄教授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并拿出了很有份量的研究报告,对八个研究问题之一的“现行课程是否適切以达致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做出了比较圆满的回答,其研究发现无论是课程设计者还是课程使用者,都认为香港的文件课程和教导的课程,除课程目的外都是筛选性质远多于普及性质^{[5]92}。这一研究对黄教授今后的工作影响深远,可以说后来的不少思考和研究,包括学校更新、教师专业发展、课程领导等都是对这一研究所发现问题寻找解决之道。

黄显华教授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始于1992年,最初是小规模进行的,到1995年,该研究获得语文基金的资助之后,开始采用CIPP模式展开规模比较大的研究,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课程与教学的知识基础》,是这一研究成果的主要体现。2001年,受香港教育署的委托,黄教授开始主持“中学中国语文《实行课程——共同发展学习材料》计划实施期间学校的改变研究”,2003年,再次受到教育统筹局的委托,开展为期两年的“新修订中学中国语文课程实施情况评估研究”。在4年期间,从课程的试行到正式实施,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从不同层面,以不同的方法了解和捕捉一项课程改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参与的学校超过百多所,这样的研究机会在香港可以说是首次。”^[6]这次对语文课程研究的结果,除了两部研究报告之外,还有9个系列小册子,分别是《新修订中学中国语文课程下的学科课程领导:角色、风格、所遇困难、解难策略和专业成长》、《新修订中学中国语文课程下教师工作文化的转变》、《教师对新修订中学中国语文课程的关注程度》等。这些著作从四个

方面,即学生层面、教师层面、科组层面和学校层面对语文课程实施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评估。

在进行普及义务教育课程研究的时候,黄显华教授就发现香港的学生在小学三四年级成绩就开始下降,有显著的学习挫败感,年级越高问题越严重,学习动机的下降也越明显^{[5]4}。这样的发现让他决心从学生个体差异出发,深入到学习动机这样一个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学生。这个研究项目从20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而其中最主要做的,不过是黄耀南和张焯昌两所小学而已,可见其研究的深度。这个研究的直接结果,一是有了《一个都不能少:个别差异的处理》这本书,二是令两所小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正通过提升学习动机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缩小了个体之间的差异。

学生学习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学生本人或者教师的事情,还需要学校做出更新,包括结构重组和文化重建^[7]。因此,不管是在语文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中,还是利用学习动机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的研究中,黄显华教授都关注到了学校更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和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所建立的大学与中学合作伙伴关系有关,一方面也和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小学增加课程主任这一职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伙伴中心的核心专家之一,黄显华教授不断深入学校,和一些学校发展主任一起为一些学校的“跃进计划”提供支持。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地参与课程主任的培育,研究校长、课程主任的合作互助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真正的更新。与此相关的成果不仅包括《教育改革的桥梁:大学与学校伙伴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与王建军合著),而且还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课程领导与校本课程发展》。

在这20年中,除了学术研究之外,黄显华教授所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为华人地区的课程研究进行奠基。前面提到的教育研究文献的整理、Chinese Eric的筹划,无不是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协同施良方、欧用生等两岸三地的著名课程学者,创立了每年一度的“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这样一个研讨会,把两岸三地著名的课程研究学人都聚集于旗下,结合教育形势的发展展开课程理论的研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两岸三地教育界的一个著名“品牌”,为课程理论研究工作两岸三地的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二、在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寻“道”

在梳理黄显华教授学术生命史的过程中,他所

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的“道”也逐渐浮现出来，成为一种有力的启示，向后来者昭示着未来前进的方向。这些道，包括了“爱”之道、“知”之道、“思”之道和“进”之道。

(一)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爱”之道

在黄教授的“道”中，最为醇厚的，当属“热爱”两个字，包括对教育的热爱和对研究的热爱。对教育的爱，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方面来自家庭的熏陶，另一方面，在他刚刚接触教育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这三个字最终促成他走上教师的岗位，在中小学工作了14年。同样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他辞别了教师岗位，拖家带口踏上异国他乡，在中年的时候重新走上了求学之路，以求对教育理解得更加透彻。这种对教育的爱，在后来他研究的过程中有很多体现。不仅他的目光始终关注教育实践，很少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和教育实践一线的教师融洽相处，能够和他们进行没有隔阂的交流，真正获得对香港课程与教学问题的真知灼见。

对教育实践的“爱”，奠定了他对课程与教学研究热爱的基础，因为这种“爱”让他真正投入到对课程与教学实践的研究中去，以极大的热情去寻找一个一个课程问题解决的方案。在《寻找课程与教学的知识基础》这本著作的序言中，黄教授直接引用了美国学者D. Walker在1992年《课程研究手册》中的一段话：

“我认为目前课程研究的最大危机是欠缺投入感和组织性支持。我们需要一些以改善重要课程问题为终身职志的课程研究员，他们要能矢志不渝、孜孜不倦，设计一系列能相互启发的研究，经年累月，不断深入钻研……我们亟需要一些以设计一套较佳的课程比建立一套教育科学更为重要的课程设计者。他们如能具备这种探究精神和坚毅的投入感，便不难找出或创造出所需的方法。”^[8]

在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这本身就是对黄显华教授的写照。他20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投入到课程与教学研究中，以普及义务课程与教学研究为线索，建立起一个融教育政策、学校更新、课程改革与实施、学习动机等为主要因素，相互联结的研究之网，为香港的课程与教学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行动启示，也为课程理论的构建奠定了面向香港教育实践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谈到自己对教育研究看法的时候，黄教授有两个观点让我们感受到十分震撼：一个观点就是在教育研究

中，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累过；另一个观点就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哪个研究是最为典型或者最为重要的，“因为哪个研究对我来说，都是有意义的，都很重要”。事实上，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了热爱之情，就像父母对待自己不同的孩子一样，哪一个都是可爱和重要的。

(二)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知”之道

在任何研究中，“知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研究一向都是以创造知识为自身使命，对知识的不同理解，不仅会导致研究者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思维路径，而且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然而，研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的，只有很好地理解了前人的研究和所创造的知识，新的研究才可能真正被有意义地加以展开。在黄显华教授从美国回到香港后，就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他在《寻找课程理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这本书的序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有些探讨课程理论的文章题目用了对某某课程的‘思考、谈谈、浮想’等用语。假如我们对课程的探讨视作为单纯的个人智性的活动，这些用语无可厚非；可是，假如我们视这些探讨的目的在建立课程理论的知识，好像其它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一般，找出一定的途径，使各个探究者都可以遵循此公认的框架和方法，建立多数人都确认的知识，并以此等知识改善学生的学习，应是处理目前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的急务。

建构课程理论知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在其间，研究人员必须首先探求别人在他打算研究的课题方面已有的贡献、不足、限制与缺点。在这基础上，运用上述方法和程序，在有关课题的万里长城，增加一砖一石。即是说，在建设这些知识长城的过程中，一是不能单靠个人主观的思考，二是要实事求是。”^[9]

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显华教授所坚持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知识观，他相信只有建立在实实在在探究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才能够真正为教育实践服务，才真正能够担当起课程知识构建的责任。一个研究的个体，其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妄谈自己的感想实际上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事情，这样会导致别人嘲笑我们教育研究论文并非论文，而可以称之为“教育散文”。正因为有这样的反省，所以黄显华教授始终没有以建构“宏大的理论”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目标，而是踏踏实实，

伏下身軀关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从探索中发现知识,力求为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增加“一砖一石”。所以,他在不断地寻觅。两本重要的著作,一本以《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一本书以《寻找课程与教学的知识基础》为题目,足以显示他那种为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进行奠基的渴望。

(三)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思”之道

早在黄教授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保罗·傅雷叶的著作,从中养成了重要的反思精神,在《课程:范式、取向和设计》的扉页上,他明确地写下:献给泰勒、施瓦布和傅雷叶。可见他对傅雷叶早已“情根深种”,而且他对反思的坚持,一直贯穿在他整个的研究当中。概括他的反思之道,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任何反思,都是在现实脉络中的反思,离开了现实的需要,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会走向无用的乌托邦式的胡思乱想。在长期反思的过程中,黄显华教授始终面对的是教育实践中浮现出来的问题。

表 1 筛选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课程的比较

	筛选课程	普及课程
课程要素	只注重内容	包括各个课程要素
课程目的	只注重知识的吸收	多元化
组织原则	只以学科的结构为课程组织的原则	以学习者特性、社会变化和需要以及学科内容为设计基础,课程组织以综合为原则
学习内容	分科设计	整体设计、分科设计和组合课程相配合
学习进度	不能照顾学习者个别性向的差异	尝试照顾学习者学习性向的差异
学习手段	不能照顾学习者个别速度的差异	尝试照顾学习者学习速度的差异
学习过程	较少运用现代科技和社会资源	尝试运用现代科技和社会资源
师生关系	并不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同学关系	较重视竞争性	合作性与竞争性结合
学习评估	采用常模参照测试和总结性测试	采用标准参照测试 除总结性测试外,亦采用形成性测试

从黄教授为普及课程所设计的评判标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人文主义倾向,那就是关注个体的特征,并以此作为促进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人文主义的标准一直贯彻到其它研究的反思之中,诸如对教师的赋权、对课程领导的培养等等,无不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

(四)课程与教学研究的“进”之道

从前面对黄教授学术生命史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刚回到香港的时候,他所做的,主要是整理香港当时的教育文献,同时对中小学的课程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到 1992 年,他开始介入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随着语文基金的进入,随着香港课程改革的推进,不断地深入。到

从普及义务教育到课程改革,从课程改革到课程领导,从课程领导到教师专业发展,从教师专业发展到学生学习动机和学校改进,都与香港的教育现实密切相关,是香港教育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在反思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批判的人文主义立场。也许得益于他耿直的性格和早期社会学学习的影响,他一直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以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看待教育。他非常欣赏哈贝马斯(J. Habermas)所提出的三种知识取向:实证的、分析的、解释的和批评的,而且在不断地为教师、学生能够超越和解放而努力,他对学校课程领导的研究,对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都是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把教师和学生导向一种解放。

他之所以会坚持一种解放的取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有一个人文主义的情结。作为杜威、泰勒的忠实信徒,黄显华教授始终坚持利用人文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和批评教育现实。在筛选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课程比较中,他采取了如下框架^[10]:

1996 年,香港开始检讨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他也参与了进来,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普及义务教育课程与教学的长期关注和研究。2002 年,香港新课程改革正式实施,他又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与课程实施有关的研究中去,包括校本课程、课程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教授的研究始终和香港教育发展的脉搏一起律动,为香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这种律动的脉搏中,黄教授的与时俱进却有着自己的主线。这种主线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以普及义务教育的课程与教学为主线,因为他始终相信休伯特所言,课程这一学术领域是和普及义务教育的出现有关系的,不管教育现实如何变化,不管课程与教学如何改革,都不能脱离这个大

的脉络。因此几乎在所有的研究中,他都没有忘记普及义务教育的使命,不断地利用普及义务教育的标准来检测课程与教学的适当性。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批判的人文主义精神,他用人文主义精神展开自己的研究,也用人文主义精神评判教育变革,更用人文主义精神引导现实教育实践的发展。

可以说,黄教授的前进之道,是在坚持自我教育信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中的理想坚持融为一体的。离开了前者,人容易迷失方向;而离开了后者,研究者就容易拘泥于自己的研究中而忘了教育的大世界。

三、在课程与教学中探“路”

(一)对“路”的重视

黄显华教授非常赞赏一句话,就是“抬头望星,脚踏实地,从心开始”。他在课程与教学研究中所追求的“道”,就是一个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抬头所望的“星星”,只有星星才能够让研究者保持头脑清醒、方向正确。当然,“道”也包括了对教育研究的热爱和热情,也就是从“心”开始的意涵。

然而,黄教授是一个非常讨厌坐而论道的学术风气的人,所以在提倡要抬头望星的同时,一定要能够做到“脚踏实地”,也就是说,一定要能够找到可以到达“道”的“路”,否则道只是一种空话、套话。

(二)拓荒之路

在“路”的探寻上,黄显华教授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拓荒,一是寻找方法。

1987年,黄显华教授刚回到香港的时候,课程的研究在世界上也不过才数十年的历史,至于香港,则更是一片空白。课程与教学要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课程与教学,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从这两个问题出发,黄教授开始了他的拓荒之旅。在拓荒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普及义务教育。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教育正是从精英筛选教育向普及义务教育转型的重要时刻。然而,不管决策制定者,还是教育实践者,都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型对于课程和教学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发现了香港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组织架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等,并不符合义务教育的要求,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在精英教育的氛围中不断下降。于是,他就以这个发现为契机,不断对香港的课程与教学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究,和香港早期其他学者一起,在一片荒芜中为香港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踩”出

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为了让课程与教学的路更加宽广,黄显华教授一直在不断寻找着志同道合者。于是两岸三地的学者团结了起来,开始了以课程学术研讨会为平台的学术拓荒之旅。从1999年至今,先后召开了10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主题:第一届:课程理论;第二届:课程改革;第三届:学校本位课程发展;第四届:课程统整/整合;第五届:课程领导与课程评鉴;第六届:课程改革的再概念化;第七届:课程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更新;第八届:课程实施与评价;第九届: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第十届:课程决策。从这10届的研讨会主题当中,我们会发现两岸三地的学者对课程的研讨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课程研究之路越来越宽广了。

(三)方法之路

在黄显华教授那里,“方法”并不仅仅指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指把课程与教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方法,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一些,因为这样,教育研究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经世致用的学科。

在教育研究方法上,黄显华教授一再强调的,就是“4W”,也就是What,你要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Who,也就是做这个研究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研究要涉及的有哪些人员? How,就是研究究竟要采取哪些可行的方法? Why,是研究有什么意义?这四个W密切配合,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整个研究要为回应上述4个问题而相互贯通、整合,成为五脏六腑血脉相连的整体。比如在1992年开始的“中、港、台、新中学中文课程研究”中,研究组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研究从本质上属于教育评价的问题,而斯塔贝姆(D. L. Stufflebeam)提出的CIPP模式,分别从脉络、输入、过程和产出四个方面分析一个课程^[11],非常符合这个研究的性质,所以就利用这个模式展开了整个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黄教授非常赞同舒尔曼(L. Shulman)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概念^[12],认为只要能够为教育问题带来答案,不一定要拘泥于某个学科或者某个范式的研究方法。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他会尽量邀请多个学科的研究伙伴,也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课程与教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方法上,黄教授有着更为卓越的贡献。他不断强调理论不管多么高妙,都要能够寻找到路径,使之落到实处,能够促进现实有所改变。我们前面提到普及义务教育课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课题,即便是如此,黄显华教授依旧寻找到了实践普及义务教育

课程的根本途径,那就是始终不要忘记学生,从学生的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考虑所有课程与教学的问题,让学生学会学习,真正做到“从读书到学习”这样一个转变。然而,如何把这些想法真正落到实处呢?围绕着学生学习动机这样一个核心,他设计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运作系统(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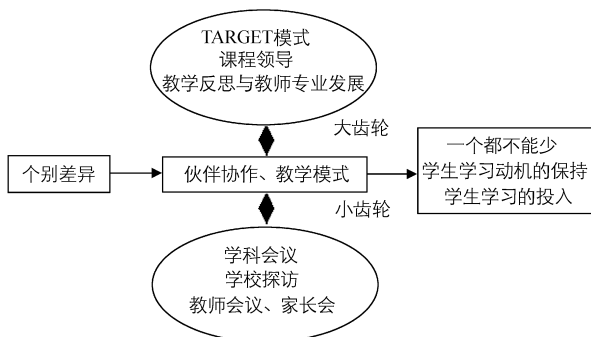


图 1 “小学生在中英数三科学习动机与模式”研究规划

从图 1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研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就是“一个也不能少”,任何学生都不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掉队,这是普及义务教育的核心理念。在这个理念之下,有两个非常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学生学习动机的保持和学生学习的投入。为了达成这样的理念和目标,必须从学生具有个别差异出发,利用艾普斯坦(J. L. Epstein)所提出的 TARGET 模式^[13]鼓励学生在过程中,关注学习本身而不是自己在社群中的表现或能力。在学校的组织更新上,则强调校长和主任在课程领导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教师的素质上,则要求教师能够进行积极的反思和专业发展。这三者构成了实现研究目标的大齿轮,通过工作坊的形式把其中的精髓传递给教师。不过,大齿轮的正确运转,还需要小齿轮来配合,这里的小齿轮,就是学科会议,研究者到学校中的探访以及教师会议和家长会。通过大齿轮和小齿轮的配合,一个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组织形式,还有实践方式的动机提升模式就出现了,才真正有了“路”去到达研究者所追求的“道”。可以说,这个设计是黄教授诸多设计中典型的一例。

四、“道”与“路”的契合

在我们理解“抬头望星,脚踏实地,从心开始”的时候,已经可以发现,在黄教授那里,“道”与“路”是融合一体、亲密无间的。“道”是环境,是基础,是目标,而“路”则是符合环境、依靠基础、达成目标的途径。只有“道”与“路”之间紧密契合,课程与教学研究才能目标远大,而同时也可以落到实处。他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课程与教学研究关系图式(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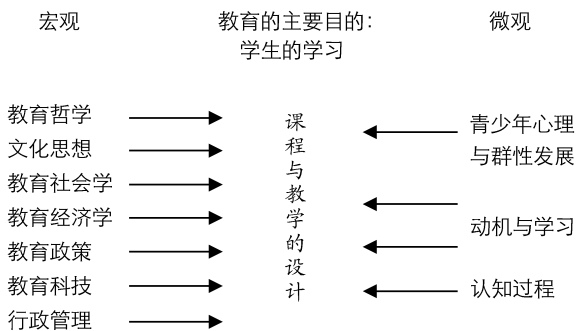


图 2 课程与教学研究关系图式

在这个图式中,课程与教学的设计是课程与教学论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而对于这个研究方向,最应该把握的目的就是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然而,课程与教学论学者要在这个领域做出适切的贡献,却绝对不能仅仅局限在课程与教学的设计这个领域内,必须把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境域,了解甚至精通诸如教育哲学、文化思想、社会学、经济学、教育政策、教育科技以及行政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把握课程与教学设计之“道”;也必须把目光投注到一些更微观的领域,比如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去理解乃至精通青少年心理与群性发展、他们的动机与学习过程、他们的认知过程,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说自己理解了学生的学习,才会设计出能够促进其学习的课程和教学来,才算是找到了课程与教学设计之“路”。

黄教授研究生涯即是这样一个把“道”和“路”融合起来的典范。在宏观方面,虽然他没有把自己所列举的领域都一一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但大多都涉猎到了。在教育哲学领域,他始终坚持的是杜威的人文主义实用哲学,把学生的自主学习放在了首位;在教育社会学方面,他坚持批判主义精神,提倡要把教师和学生从现有体制下解放出来,超越自我;在教育政策领域,他关注课程决策,从中窥视决策之所以产生和演化的奥秘;在教育科技方面,他为新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还不断地鼓与呼;在行政管理领域,他关注学校更新,培育课程领导。他的这些工作,无不是为强迫普及义务教育的设计和 implement 奠定基础。在微观领域,他倾注了更多的心力,而其中最为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则是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符合他的哲学,也符合香港教育的现实。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他做了不少课程与教学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包括中学中文科课程、TARGET 提升学生动机的教学模式、教师专业发展与课程领导培养的课程等等。所有这些课程和教学设计,都围绕着学生的学

习,而不是围绕着教师的教或者教材来进行,体现了鲜明的特征,体现了普及义务教育的目的。

五、结语:身心合一的行者

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道”和“路”一方面融合成为了一个系统,勾勒了黄教授研究生涯的图景,但是另一方面,“道”与“路”也融合在他的心里,让他能够真正做到“从心开始”。

作为一个教育学者,黄教授十分反对那些讲授、研究教育教学理论,却把自己的课堂上的一团糟的人。他觉得一个研究者应该尽量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实践出来,不能用非人文的方式来讲述人文主义的东西,或者自己高度赞扬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却连一节具有建构主义风格的课堂都上不出来。在他的课堂上,他会尽量运用一些自己赞同的教育理论。比如,他非常赞同形成性评估,在讲授“课程与教学的基础理论”这门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运用形成性评估的方法,每次上完课,就会循序渐进地布置一个作业,让学生围绕着自己的主题不断地思考、写作,而他每次都会对学生所写的东西进行评估,写出修正的意见。等这门课结束的时候,学生已经就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把这些原来写作的东西整合起来,就是一篇很不错的学科论文了,学生对课程与教学的理论基础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再如他认为建构主义所提倡的“脚手架”(Scaffolding)理论,就在他教学的时候运用了类似的策略。他讲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就用了“三头牛”的故事,在有趣的故事中形象地说明要让学生学习,必须使学生自己有动机,但是人们对动机的理解,其实是有不少歧见的,最好能够结合不同的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

长期以来,黄教授就是这样把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以及理论背后的信念,真正融合到了自己的内心,并从内心生发出智慧来。这种内在的融合给他以强大的信心,让他可以做一个质朴的人,一个从

心开始,口言心中所思,身行口中所言的身心合一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一个坚定有力的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修行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黄教授经常用于自勉的话语,我们期待着黄教授能够继续长征,为课程与教学研究这座长城,添加更多的砖和石。

参考文献:

- [1] Clandinin and Connelly (e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andscapes*[M].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5: 23.
- [2] 佚名. 不再“教书”——黄显华[J]. 中大校友, 33: 18—19.
- [3] Schubert W H. *Curriculum: Perspective, paradigm, and possibility*[M]. New York, U. S. A.: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4] 黄显华, 霍秉坤. 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2.
- [5] 黄显华. 九年免费强迫教育研究报告书[F]. 香港: 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1996.
- [6] 黄显华. 新修订中学中国语文课程下学习材料的选用和调适[M]. 香港: 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香港教育研究所, 2006: 3.
- [7] Fullan M. *Leading in a Culture of Change*[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1: 21.
- [8] 黄显华. 寻找课程与教学的知识基础[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序言.
- [9] 黄显华、霍秉坤. 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序言.
- [10] 黄显华、霍秉坤. 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修订版)[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44—45.
- [11] Stufflebeam D L, Shinkfield A J. *Systematic evaluation* [M]. Boston: Kluwer-Nijhoff Publishing, 1985.
- [12] Shulman L S. *Paradigms and research programs in the study of teaching: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G]// In M. C. Wittroc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3rd ed.). pp. 3—36. N. Y.: Macmillan, 1986.
- [13] Epstein J L. *Family structures and student motiv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G]// In C. Ames & R. Ames (eds.). *Research on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责任编辑 曹 莉

Professor Wong Hin Wah's Rules and Routes in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JIN Yu-le, YU Ze-yuan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Wong Hin Wah is a founding member for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e devo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with great enthusiasm. He began to think and practice teaching ideas as a middle school and primary teacher. After getting the doctoral degree in the USA, he has been immersing himself in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20 years. In this process he experienced the rules of love, knowing, reflex, and forgoing. He made through a pioneering route and a methodology route of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tried his best to pursu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ules and routes.

Key words: Wong Hin Wah; curriculum; instruction; research